

第一次全国李大钊学术讨论会的回顾

韩一德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1984 年 10 月,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李大钊学术讨论会汇集了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开启了李大钊研究新的征程。从此,李大钊文献整理有了新进展,研究论文、专著大批涌现,推动了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成立起了促进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李新、彭明、张静如诸先辈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唐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李大钊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1-0001-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1.001

A Review of the First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 Dazhao

HAN Yi-d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In October 1984,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irst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 Dazhao was held, which started a new wave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Li Dazhao.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on Li Dazhao.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and monographs have been published, which, in turn, have l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into Li Dazhao. In this process, the late Li Xin, Peng Ming, Zhang Jingru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Tangshan;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 Dazhao;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Li Dazhao

斗转星移,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全国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距今已 34 年。许多出席会议的老一代革命家和学者已经作古。2016 年 9 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张静如先生的去世,又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李大钊研究的带头人。逝者远去,而他们在那次会上的音容笑貌、学术追求,至今仍存留记忆,难以忘怀。回顾第一次全国李大钊学术讨论会,将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些历史信息,兼为纪念张静如先生。

一、缘起与筹备

李大钊是集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于一身的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和开辟中国革命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他的著述之丰、理论创新和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李大钊的声誉受到污损,研究活动完全停滞,“文化大革命”后

作者简介:韩一德(1932—),女,辽宁大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成为拨乱反正首先触及的话题之一。1979 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又恰逢李大钊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界开始发表纪念李大钊的文章,尤其是李新同志受党中央指派,在首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研究李大钊,学习李大钊》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全面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他的遗文将永住,这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号召学习李大钊的精神遗产,开展宣传和研究。这个报告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河北是李大钊的故乡,人们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宣传和研究李大钊责无旁贷。所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便将其列入选题项目,决定从基础做起,着手编写《李大钊年谱》。一方面查找报刊文献资料,同时访问还健在的当事人,先后访问过刘仁静、张申府、罗章龙、刘弄潮等早期革命家。经过两年的努力,收集整理了将近 20 万字的书稿,1984 年,《李大钊年谱》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前后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介绍李大钊生平的文章,虽然受到当时思想水平的局限,内容比较粗放,然而总算有了开始,正是有了这一基础,才使我们有了提出召开全国李大钊学术讨论会的可能。

那是 1983 年 10 月,在承德召开的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省社科联)年会上,我向当时省社科联肖永庆副主席提出能否在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时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李大钊学术会议,这个想法得到了同是乐亭出身的肖副主席的热情支持,答应可以申请专门经费并建议在唐山乐亭召开。既然是学术会议就必须有学界的支持,为此在回程路经北京时,我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拜访建国后最早研究李大钊思想的张静如教授,他当即热情地表示“这是好事,完全支持,乐见其成”,并提了许多建议,答应帮助联络学界朋友。有了张先生的支持,我心中多了些底气。

回到石家庄又得到德高望重的石虹老院长的支持,他指示以省社科院和省社科联的名义向省委提出报告,争取主管书记高占祥的批示。

经过不少周折得到了省委的批示,便着手具体的筹备工作,向全国发出征集会议论文的通知。

这时历史所的李大钊研究集体已经解散。黎典同志调去做行政工作,杨树升、张燕调往北京,夏自正去做他擅长的古史研究,剩下坚守的只有我一人。关于会务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由唐山市委、乐亭县委负责,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安排非常周到。作为会议学术方面的准备,除征集论文外,我们着手编辑 70 万字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收集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以来有关纪念和研究李大钊的文章近百篇。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已故老同学王树棣教授利用他在北大工作的条件,帮助查找有关报刊资料,做了大量工作。我则日夜兼程抄录整理,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统一注释为页下注,将近一半的文章进行重新抄写。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很快将书印出,同时出版的还有《李大钊史学论集》。

还有一件带有偶然性的事情。1984 年 6 月,在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筹备会,我和张静如谈起希望查找在华日文刊物上有关李大钊的资料,他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为此,会后我便前往大连图书馆,在落满灰尘的日文刊物《北京周报》上,发现了后来收入《李大钊全集》中的 3 篇重要佚文:即《关于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谈话》(第 8 号)、《孙吴两氏与中国统一的方策》(第 33 号)和《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第 74 号)。一次发现这么多重要的文献,曾使我兴奋不已,难以成眠。当即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可以说这也成为会议学术准备的一部分。同时,这三篇佚文的发现启示我们,有可能在其他日文刊物上仍有未被注意到的李大钊佚文,果然,之后又在《新支那》等日文刊物上发现多篇李大钊论述社会主义及中国革命的重要佚文。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长期从事李大钊研究的日本学者后藤延子提出申请参加。当时外国人出席会议还是新鲜事,需要许多的报批手续。首先是天津以外的地区不开放,外国人到唐山地区需要有天津市公安局的特别审批,接待方

面也要有特别安排,这都增加了工作难度。幸有刚调到省社科院的日文专家刘多田先生,帮助我在翻译、接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会议盛况与学术讨论

1984年10月11日至16日,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乐亭县如期召开。这是李大钊研究首次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十多个省区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党史研究部门,共计一百余人,提交论文五十余篇。由于李大钊的特殊身份,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李运昌、张明远、李葆华等参加了会议,还有省市领导出席了讨论会,主席台坐得满满的。学界出席的代表主要有:张静如、彭明、刘桂生、朱成甲、马模贞、吴家林、姚维斗、王世儒、吕明灼、谭双泉、杜蒸民、刘民山等。省社科院石虹院长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大事难事都向他求教解决。《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对会议作了专题报道。大会开幕后,全体代表前往大黑坨村瞻仰李大钊故居。

纪念仪式结束便进入学术讨论阶段。学术讨论围绕两方面内容进行,其一是如何积极而实事求是地进行李大钊生平史料及佚文的收集、整理、鉴别。在这方面,大家一致强调收集李大钊佚文和生平史料的重要性,史料文献的缺乏,无法使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例如,李大钊早期是否对袁世凯有一个认识过程?在此次会议之前,朱成甲在《历史研究》(1983年12期)发表了《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从拥袁到反袁的发展过程。这篇文章在会上会下曾引起不小的波澜,不少人不能接受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还要有一个“过程”这一论断。不能理解李大钊怎么还会拥护过袁世凯?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长期以来,人们接触到的史料非常有限,唯一能读到的6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选集》,就曾将李大钊文章中批判国民党、拥护袁世凯的文字删除。文字资料见不到,没有宽松的研究环境,就容易从感情出发。经过这次讨论,大家认识到研究早期的李大钊,必须弄清民初的政治环境和读懂李大钊的早期文

献,从而理解李大钊早期确实存在对袁世凯从拥护到反对的认识过程。这是民国初年的政治现实和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实际,从而承认朱成甲一文实事求是、有理有据,是李大钊研究的一次突破。

再例如,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究竟是“罢学而归”“弃学而归”还是被“除名而归”?这些只有弄清李大钊受进步党汤化龙资助的留学背景和查找早稻田大学的学籍史料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接受因误课而被除名的事实。通过这次讨论,大家确信“即使像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他的思想发展也离不开时代背景,必然带有时代烙印,须有曲折的发展过程”这样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基于这一认识,开始了收集李大钊佚文和生平史料的工程。这一工程最初列入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项目,由我和金淑琴负责,开始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开图书馆及各地档案馆翻阅查抄民初的报刊资料,我们天天开馆时进,闭馆时出,中间一个烧饼充饥,乐趣满满、不知疲倦。后来又有王世儒、杨树升、姜庆明加入,经过前后4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近60万字的《李大钊史事综录》一书。1989年李大钊诞辰百年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时参与工作的3位年轻人已经出国,联系出版事宜王世儒出力最多。应该说这本翔实的史料集,在当时条件下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依据。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他何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段时间以来,在研究李大钊思想的文章中,沿袭着他在留学时期已接受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甚而有人认为在《言治》时期他就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曾经持这种认识的人中就有张静如,张静如说这几乎是早期文章的共识,并探讨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不能科学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也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水平,常常靠个别人的回忆材料。例如,高一涵等人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就谈到过李大钊在留学

时期已经阅读了河上肇翻译的《资本论》。而事实上河上肇所译《资本论》在日本的出版,已经是1920年以后的事情。这些情况都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脱离实际的习惯思维。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在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前后。然而究竟以哪一篇著作作为标志仍然存有不同见解,多数与会者表示当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为标志比较符合实际。在讨论中还涉及到李大钊思想发展中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怎样理解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论”等问题,争论热烈。这也说明,克服实用主义史学观的影响,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日本学者后藤延子在会上提交了《三个对李大钊有影响的日本人》的论文,她在探讨堺利彦、河上肇等日本早期思想家对李大钊的影响时指出,“人类文化无论何时都不能超脱外来影响而存在,在许多情况下,影响和模仿正是有了接受它的基础之后才可能产生。”“李大钊在把日本思想家的文章,译著作为蓝本使用时,是作为促进他思想独创地发展的养分而使用的。”

三、意义和影响

这次会议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贯彻了学术民主和自由讨论的原则,思想活跃,争论激烈。石虹院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会风的改革,科学的、民主的学风的形成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

但是,在会议的进行中也遇到过一些小的插曲。本来会议的接待,乐亭县做了周到的安排,会议伙食办得非常好,大螃蟹几乎天天都可以吃到,但在住宿和用餐方面,参会领导与学者没能同等对待,便发生了张静如“罢宴”事件。当张静如发现只有他和彭明2人能够享受小灶时,性格刚直的张先生立即表示拒绝,返回到大餐厅。经张先生的提议,也就马上取消了“分等”用餐。

再就是谢百三闯会事件。2016年,谢百三去世,网上发表了不少纪念复旦大学这位名师的文章,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他闯会的一幕。

会议开始的第2天上午,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谢百三赶来乐亭要求参加会议。这种不请自来使会议组织者很为难,有关领导考虑安全问题没有同意。谢百三不死心,转而找到我,作为老师的我们,觉得他的精神可嘉,便请张静如前往协调,我则通过石虹院长的默许将他留了下来。谢百三是一位活动能力极强的人,他找到每一位与会者将他们个人的论文抽出,从而收集到大会的全部论文。从这件事看出他的执着和能力,他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复旦名师不是偶然的。

最使我遗憾的是会议论文集出版的流产。对学术会议而言,论文的刊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原计划已向与会者布置了论文的出版要求。由于经费原因文集最终没有印行,致使那次会议没能留下完整的历史资料。这件事我至今不能释怀,看来学术研究真的需要争取到起码的自主经费保障。

以上几件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也许是历史发展必经的过程。总的来说,那次会议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它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从此,李大钊诞辰逢五逢十,分别由河北和北大组织举行纪念性学术活动,这种情况延续至今。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李大钊研究者的联合。为推动李大钊研究,与会者强烈要求成立李大钊研究团体,并推举了以张静如为首的7人筹备组。这个筹备组最初打算挂靠河北,后来因一些问题不能解决,而挂到北京市党史学会,活动地点设在北京市委党校。经常参加活动的成员主要有张静如、彭明、刘桂生、朱成甲、马模贞、吴家林、王世儒、姚维斗、韩一德、杨树升、金淑琴、姜庆明、侯且岸等。这个团体确定以五四时期的社团精神和生活准则要求自己,入会者必须提供研究成果以保障会务活动的学术水平。团体活动的内容,多为收集分析学术信息,报告个人研究情况,讨论有关李大钊研究过程中的各种

问题,尤其是为青年学者提供具体指导。例如,在《李大钊史事综录》收集史料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曾做过数次讨论。记得会后常常都是张静如请大家吃饭,这个群体建立的深厚友谊保持至今,它为1989年正式成立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做了组织准备。

第二,推动了李大钊研究的发展。乐亭会议之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两三年内报刊发表的文章近百篇。不仅数量上有相当的规模,而且以刘桂生、吴家林、杜蒸民、吕明灼等为代表的学者发表的一批论文,具有很高的质量。尤其朱成甲撰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以其详实缜密的史实与理论分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更为可喜的是,李大钊的故乡唐山地区涌现出以李权兴、董宝瑞为代表的研究者,他们对李大钊的家庭及青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和思想变化深入收集资料 and 进行研究,在李大钊诞辰百年前夕,出版了《李大钊研究辞典》。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朱文通为首,出版了《李大钊年谱长编》,这都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更多参考资料。

随着李大钊佚文的收集,北京市委党校朱乔森、吴家林等同志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李大钊文集》,收文438篇。而60年代出版的《李大钊选集》收文仅133篇。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就靠着这本不完整的书,了解和研究李大钊,可以想见会受到多大的局限。不久,又新发现佚文46篇,出版了续集。这都为90年代末河北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以及后来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大钊全集》准备了条件。新版全集不仅内容充实,装帧也非常精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秘书长古平同志尽了很大的力,也说明李大钊研究确实是一项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学者薪火相传的集体工程。

第三,促进了李大钊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外学术研究的情况一无所

知。事实上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撰写和整理了不少关于李大钊的生平史料和研究文献。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莫里斯·迈斯纳的专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出版不久就在日本有了译本(丸山松幸译),在我国直到1989年才有译本印行。本书立论公允,引用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充分肯定了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1969年,在前苏联出版了学者加鲁尚茨编辑的《李大钊论文演讲集》。尤其日本学者森正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李大钊》一书,提供了李大钊留学时期宝贵的原始资料,还有丸山松幸与斋藤道彦编辑的《李大钊文献目录》收文百余篇。与此同时,日本后藤延子等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关李大钊生平与思想研究的论文。这次会议更开启了中外学者交流的先河,各国学者不断到中国考察交流。国外的研究成果曾经对中国的李大钊研究以借鉴和促进。终究中国是李大钊的故乡,一旦有了开放的条件和基本的资料,我们的研究就会有更高水平的进展,反过来对外产生影响。到李大钊诞辰百年纪念时就有前苏联、日本、捷克、意大利、蒙古国等更多国际学者出席学术讨论会。

当我们回顾李大钊研究的历程时,不能忘记建国前后以王森然、蔡尚思、方行、刘弄潮为代表的研究者和前几年去世的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彭明先生,他们都曾为李大钊研究付出心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尤其睿智明达的张静如先生,他不仅自身带头著文写书,而且更难得的是在团结研究队伍、扶植后学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组织者,一位热心学术事业的朋友。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新时代李大钊研究寄希望于年轻学者,希望他们继承和发扬李大钊研究好的传统,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探索创新,取得更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李亚平)